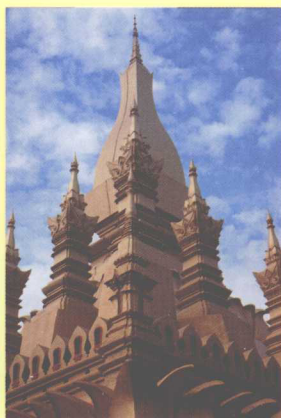




察哈尔公共外交丛书

韩方明 主编



Public Diplomacy of  
China and Southeast  
Asian Countries

# 中国 与东南亚国家 公共外交

亚学研究中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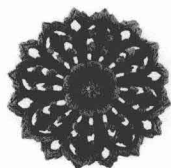
主编

柯银斌 包茂红 执行主编

新华出版社

# 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公共外交

Public Diplomacy of China and Southeast Asian Countries



北京大学东南亚学研究中心 主编  
察哈尔学会

柯银斌 包茂红 执行主编

新华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公共外交/柯银斌, 包茂红主编

北京: 新华出版社, 2012.9

ISBN 978-7-5166-0110-5

I. ①中… II. ①柯… ②包… III. ①中外关系—东南亚—学术会议—文集

IV. ①D822.333-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222844 号

## 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公共外交

作 者: 柯银斌 包茂红

出 版 人: 张百新

责任编辑: 张 程

封面设计: 燕清创意

责任印制: 廖成华

出版发行: 新华出版社

地 址: 北京石景山区京原路 8 号

邮 编: 100040

网 址: <http://www.xinhupub.com>

<http://press.xinhuanet.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购书热线: 010-63077122

中国新闻书店购书热线: 010-63072012

照 排: 新华出版社照排中心

印 刷: 北京新魏印刷厂

成品尺寸: 160mm×240mm

印 张: 12.25

字 数: 160 千字

版 次: 2012 年 10 月第一版

印 次: 2012 年 10 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66-0110-5

定 价: 29.80 元

图书如有印装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010-63077101

# 察哈尔公共外交丛书

## 编辑委员会

主 编：韩方明

副主编：赵可金 柯银斌

编 委：（按姓氏笔画排列）

王义桅 《公共外交季刊》学术编辑、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同济大学特聘教授、国际与公共事务研究院执行院长

刘 宏 《公共外交季刊》学术编辑、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南洋理工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院长、教授

刘贞晔 中国政法大学政治学与行政管理学院教授

余万里 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

肖欢容 中国传媒大学国际关系研究所所长、教授

陈雪飞 外交学院公共外交研究中心主任、公共外交教研室主任

李晨阳 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云南大学中国—东盟公共外交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张 爽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国际政治系主任、副教授

张志洲 北京外国语学院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

张胜军 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庞中英 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周庆安 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研究员、公共外交研究室主任

胡 伟 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院长、教授

柯银斌 《公共外交季刊》编辑部副主任，察哈尔学会秘书长、高级研究员

赵 磊 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所副教授

赵可金 《公共外交季刊》编辑部副主任、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清华大学中国战略与公共外交研究中心主任、副教授

段跃中 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日中交流研究所所长

贾庆国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教授

唐小松 《公共外交季刊》学术编辑、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广州外语外贸大学外交学系教授

郭惠民 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教授

韩方明 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副主任、察哈尔学会主席

韩召颖 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教授

## 总 序

全球化和信息技术革命改变了世界。冷战结束以来，全球化加速发展，信息爆炸，无论是加拿大传播思想家麦克卢汉的“地球村”预言，还是《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世界是平的》的感叹，全球化和信息技术革命日益将世界各地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蝴蝶效应”的威力已经日益明显地为当今世界各地的人们所深切感受。海湾战争中伊拉克焚烧科威特油田产生的浓烟在喜马拉雅山形成了黑色的降雨，南联盟的冲突造成了欧洲的难民问题，来自冰岛火山喷发的灰尘几乎令全球航空陷入瘫痪，而爆发在美国的全球金融危机令几乎所有地球人都胆战心惊。

然而，在整个世界一体化程度不断加深的同时，全球范围内掀起了一场“结社革命”，过去长期在国际关系中被漠视的社会力量在国际事务中日益活跃，成为各国外交不得不面对的重要力量。根据《国际组织年鉴》统计，国际非政府组织的数量在过去的10年中已经增长了4倍多。有人对此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它对20世纪后期的意义，如同民族国家的兴起对于19世纪后期的意义一样重大”。被卷入全球化体系中的世界各国几乎都陷入了“我们是谁”的身份认同危机，差异化、多样化和多元化日益成为全球化时代的特征，除了传统的阶级差异、意识形态差异外，“文明的冲突”、民族分离主义、族裔政治、女性主义、同性恋群体、新宗教、恐怖主义、网络组群、生态运动等日益崛起，人们不得不面对更加紧张的多元文明、复杂差异和社会断裂而产生的深刻矛盾和频繁摩擦。如何在一个以信息、权力和公共资源为主要生存轴心的社会平台上，在多元化、多样性和差异化的公共空间中有效地调适差

异主体之间的交往，调适人—自然—社会间的矛盾关系以及调适“我”与“他者”之间的断裂，在社会多样化的矛盾空间中寻求全球治理的一体化，妥善协调矛盾和谨防冲突，谋求全球正义，成为当今这个时代的一个主要任务。

环顾世界，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随着经济全球化和社会信息化深入发展，内政和外交之间已不存在不可逾越的界限，国内问题国际化和国际问题国内化两种趋势交织发展。在经济、科技、军事等领域的传统硬实力竞争依然激烈的同时，以意识形态、价值观念、制度模式、政治主张、民族精神、国家形象、文化传统影响力等为主要内容的“软实力”竞争也日渐升温。公共外交是加强“软实力”建设最重要、最有效的途径之一，在各国总体外交中的地位和作用大幅提升。面对这一世界性的问题，公共外交勃兴，成为世界各国政府的新宠，各国都在把开展公共外交作为一项“国际民心工程”纳入国家大战略中来。作为当今世界唯一超级大国的美国，在2001年9月11日之后加大了对公共外交的投入，从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多年来鼓吹的“软实力”理念到奥巴马政府在世界各地推行的“巧实力”外交，从美国前国务卿赖斯提出的“转型外交”到克林顿国务卿倡导的“公民外交”，美国从理念到战略，从体制到措施，已经形成了体系完整、多管齐下的公共外交战略，在世界各地开展了如水银泻地般的国家形象传播活动。除了美国以外，英国近年来竭力推进的“创意英国”活动，加拿大政府谋划已久的“轻松连线加拿大”，韩国政府全民推进的“活力韩国”，太平洋岛国文莱、海湾小国阿联酋以及北欧国家挪威等也把塑造良好的国家形象摆到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开展了一系列饱受关注的活动。此外，如果加上法国、德国、西班牙、日本等国在世界各地经营多年的以海外语言教育为主要内容的“语言外交”，世界各国轰轰烈烈开展的各种文化节、文化年以及旅游促销活动更是丰富多彩。目前，世界各国特别是主要大国都高度重视公共外交，强化相关机制。大力推进公共外交已成为国际潮流，以至于有学者惊呼，“当今世界已经步入公共外交时代”。

对我国而言，加强公共外交既是一项紧迫的现实任务，也是一项重大的长期战略。近30年来，我国在硬实力层面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已大

大缩小，甚至在某些领域已经形成领先局面。现在，我国外汇储备世界最多，是世界第一出口大国和最广阔的消费市场，有世界上最好的高速铁路和运行速度最快的超级计算机，手中握着的“世界第一”头衔日趋增多，今年的国内生产总值也将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在我国成功举办北京奥运会、上海世博会和有效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后，我国的发展道路和模式在国际上得到更多关注和认同。但从总体上看，我国“软实力”建设仍相对滞后，国际上对中国的不了解、误解和成见、偏见仍然普遍存在，西方有些人对中国的快速发展心态矛盾复杂，心存疑虑、戒心，甚至戴着“有色眼镜”观察、评估我们。西方主导的国际媒体也不时炒作“中国威胁论”等负面论调。这不仅损害了我国的国际形象，也给对外交往带来不少消极影响。另一方面，我国国内媒体、公众对外交事务的参与度和关注度也不断提高，作用和影响正在增大，在对我国外交工作形成有力支持与配合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不够冷静、不够理性的声音和行动。面对新形势新挑战，公共外交成为我国外交的一项极其重要的战略任务。

置身公共外交在世界范围内拓展的潮流，中国成为其中一个耀眼的角色。从2008年成功举办北京奥运会到2009年国庆典礼，从2010年成功举办上海世博会到遍及世界各地的“中国文化年”活动，公共外交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我国日益重视开展公共外交，将其作为总体外交工作大力拓展的新领域，加大投入，致力于增信释疑、扩大共识，不断探索新思路、新方式，这方面工作已经取得长足进步。我国国家领导人率先垂范，在出席重要国际会议和出访时，主动接受国外媒体采访，向外界介绍中国国情和大政方针，取得很好效果。我国驻外使节和各级外交官积极“走出去”，通过接受采访、发表演讲、公开撰文、座谈对话等多种方式向驻在国各界宣传介绍我国发展成就和理念。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十二五规划”中也专门提出要“加强公共外交，广泛开展民间友好交往，推动人文交流，增进中国人民同各国人民相互了解和友谊”。不难想见，在今后一段时期内，公共外交将成为中国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尽管公共外交在中国的发展历史还很短，但是发展速度很快，目

前，公共外交在中国已经成为了一门显学。包括许多高校在内，纷纷成立了各种公共外交研究和教学机构，各高校、研究机构和社会团体，也举行了多次有关公共外交的研讨会。以上努力，对进一步推动中国公共外交领域的研究，为政府公共外交实践提供政策建议，促进国民参与公共外交活动，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然而，在公共外交的热潮中，我们作为早期推动者更应该冷静下来，不要重复“一窝蜂”地上、“热闹”半天无果而退的老路子。应该夯实基础，切实地对世界主要国家的公共外交实践进行全面、具体的研究梳理，对已有的公共外交理论真正地把握，尤其是要对中国的公共外交活动进行全面的分析、总结和提炼，从而形成中国的公共外交理论。

作为一家新成立的非官方国际关系与外交思想库，察哈尔学会在2009年10月成立伊始就迅速组织专门力量开展公共外交的研究。目前，除了承办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主办的中国第一本公共外交杂志《公共外交季刊》、邀请在公共外交领域具有深入研究的知名专家学者作为学会的高级研究员以及每年定期举办察哈尔公共外交研讨会之外，公共外交研究与传播是我会近两年内的工作重点，我们非常愿意与各类机构开展多种形式的合作，在扎实的基础上，继续推进我国的公共外交研究与传播事业。

为了推进公共外交的理论研究和战略研究，为中国公共外交事业提供精神动力和理论支持，自2011年起，察哈尔学会推出“察哈尔公共外交丛书”，通过支持国内学者关于公共外交研究著作的出版，翻译引进国际学界对公共外交研究的优秀成果，推出中国学者研究公共外交的最新成果，激励中国社会各界展开热烈的学术讨论和战略辩论，不断推陈出新，把中国公共外交研究推向一个新的更高的水平。我们盼望越来越多的志同道合者加盟，深化公共外交的基础理论研究，为推进我国公共外交事业而不懈努力。

韩方明

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副主任 察哈尔学会主席

2011年2月于北京



## 以公共外交手段 推动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睦邻友好

韩方明

(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副主任、察哈尔学会主席)

东南亚各国与我国山水相邻、唇齿相依，既是地理上的邻居，也是战略上的伙伴。一直以来，中国高度重视与东南亚各国的睦邻友好关系，积极推动亚洲地区的和谐和稳定。冷战后的世界格局始终处于激烈的变动之中，不同国家地区之间的联系日益紧密，竞争也越来越激烈。民间层面的经济贸易和人员往来的急速增长，对各国的传统外交带来了巨大的挑战。面对新的复杂局面，公共外交逐渐被政府、学界以及更多的人们所重视。

公共外交进入中国的主流话语只有短短几年的时间。得益于本届全国政协外委会的不断推动，公共外交受到了全社会的广泛重视。公共外交工作已成为我国全方位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越来越多的民间组织、企业、个人开始参与到公共外交的理论探讨和实践推动中来。由我本人创立的察哈尔学会做了很多基础性、开创性的工作：承办了第一本中文公共外交期刊《公共外交季刊》；出版了第一本公共外交教材《公共外交概论》；连续两年举办了“察哈尔公共外交年会”，使之成为具有一定国际影响的公共外交盛会，吸引了越来越多来自国内外政府部门、学术界、媒体界、企业界的行业精英共同参与。

深化和优化中国与东南亚各国的交流合作，尤其需要公共外交的助力，需要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围绕如何开展中国与东南亚的公共外交，我提出如下一些建议：

推动中国与东南亚的公共外交要制订国家层面的战略规划。我们呼吁应当将公共外交上升为国家战略，成为建设文化强国的重要组成部分。要将公共外交视作增进与东南亚国家友好关系的核心手段。建议外事部门应该放下过去大包大揽的思路，采取政府搭台、民间唱戏的做法，调动企业、媒体、社会和个人共同努力，倾力配合。为以往缺乏交流机会的民间人士创造机会，搭建舞台，切实增强睦邻友好的真实性和感染力。

推动中国与东南亚的公共外交要借助双方媒体的传播能力。我们要充分重视运用各国媒体的主渠道，一方面用普通人的情感、民间的故事，把一个真实亲善的中国展示给东南亚；另一方面也要鼓励更多的中国媒体走出去，将真实的东南亚呈现在国人面前。还应该鼓励民间举办各个层次的媒体交流，加强双方媒体精英、知识分子就不同议题进行互动讨论，淡化误解、缩小分歧。

推动中国与东南亚的公共外交要调动华人华侨、知华亲华人士的作用。东南亚华人华侨约三千余万人，悠久的华侨历史帮助当地的华人以及其他族裔涌现出了一大批熟悉彼此文化、社会，乐于促进友好的“亲华人士、民间大使”。应当举办各类庆典、展会、文化活动，不仅要走出去还要请进来，推动当地华人华侨及知华亲华人士在各个领域里自觉地扮演好“民间外交官”的角色，积极开展公共外交活动。

推动中国与东南亚的公共外交要重视提升国民素养，培养公民理性，克服居高临下的虚妄大国主义。善于换位思考，善于包容不同观点，通过耐心细致的深入交流，知情明意，有的放矢，逐步溶解文化的误解和偏见。在尊重亚洲多元文化基础上，寻求具有包容性的共识。我们应当学会尊重东南亚社会各种不同意见，注重用交流和对话来增进彼

此了解，用行动来化解偏见，树立一个包容的、负责任的、扶危救困的中国国家形象。

推动中国与东南亚的公共外交还要鼓励民间组织的发展。民间组织是公共外交重要的行为主体，我国要全方位培育和发展公共外交的参与者。要学会依托非政府组织，如民间智库、文化团体、环保机构、宗教组织等。在各自领域对话东南亚的政党、非政府组织、普通公众，吸收更多的智力资源，传导多元丰富的中国形象。我想，在这方面北京大学东南亚学研究中心和我本人领导的察哈尔学会已经做出了许多有意义的探索。

北京大学东南亚学研究中心是学术界公认的跨学科从事东南亚问题综合研究和咨询的重要学术机构。多年来，中心与东南亚教育科研机构、政府部门、涉外机构都建立了充分的联系。我们欣喜地看到研究中心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它在推动我国东南亚学术研究不断深化的同时，也促进了与东南亚各国民间组织的交流和合作。我希望北大东南亚学研究中心取得更大的进步，能更多研究和提炼中国与东南亚和睦相处的文化价值和现实路径，深化双方公共外交开展的优化机制，为促进和谐、稳定、富强、文明的亚洲作出更大的贡献。

预祝此次研讨会圆满成功！祝各位学者身体健康！

谢谢大家！

2011年12月16日



|     |                                    |
|-----|------------------------------------|
| 1   | 序言：以公共外交手段推动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睦邻友好 / 韩方明    |
| 1   | 崛起的中国需要什么样的公共外交 / 贾庆国              |
| 8   | 全球外交转型中的中国公共外交 / 赵可金               |
| 16  | 在缅泰印从事公共外交的经历和体会 / 程瑞声             |
| 22  | 中国在东南亚的国家形象 / 翟崑                   |
| 30  | 构建中国公共外交新局面的思考 / 杨鲁慧 李燕燕           |
| 40  | 试析中国对越公共外交的若干问题 / 徐方宇              |
| 56  | 中国急需加强在缅甸问题上的公共外交 / 李晨阳 祝湘辉        |
| 63  | 浅析中国对老挝的公共外交发展状况 / 刘玥              |
| 69  | 现代中缅教育方面的往来对两国关系的影响 / 李谋           |
| 82  | 佛教与中国公共外交：以东南亚国家为例 / 黄云静           |
| 100 | 东南亚华侨华人的公共外交 / 梁立基                 |
| 110 | 当代留学大潮的兴起与中外文化交流 / 梁志明             |
| 123 | 文化推广在公共外交中的作用 / 林慧晗                |
| 135 | 贝叶文化与中国—东南亚“和谐周边”的构建 / 谢念亲         |
| 147 | 从越南快讯网涉华报道反映的“中国形象”管窥对越公共外交成效 / 兰强 |
| 157 | 试论苏哈托对中国的认知 / 张旭东                  |
| 165 | 日本对大湄公河次区域的公共外交 / 赵姝岚              |
| 177 | “中国东南亚关系与公共外交”学术研讨会综述 / 杨国影        |
| 182 | 编后记                                |

# 崛起的中国需要什么样的公共外交

贾庆国<sup>①</sup>

崛起的中国有三大特征：规模大、变化深刻、身份不确定。这导致中国对外部世界的需求在许多方面有所不同，如国家利益的界定及维护权益的方式和力度，对世界秩序的追求等。崛起的中国一方面需要公共外交，另一方面从事公共外交更为困难。虚心学习，讲一个别人听得懂的真实的中国故事，是中国需要的公共外交。

## 一 “崛起的中国”是什么？

第一，崛起的中国是一个崛起的大国，它跟一个崛起的小国不一样，它跟一个不崛起的大国也不一样。

首先是规模大，它崛起的后果和影响会很大。过去几十年，中国的综合国力快速增长，在很多生产要素方面，至少从量的角度来讲，我们在世界上实际上已占第一位，比如说钢铁产量已远远超过其他国家。同时，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也在迅速提升，所以现在中国的一举一动备受世界的瞩目和关注。这跟过去不太一样。过去中国和周边国家发生什么事情，国际社会不太关注，而现在中国和周边国家发生的事情，全世界都在关注，观察中国到底怎么处理。因为所有的国家将来都面临一个问题——和中国发生纠纷以后，中国将如何处理。

---

<sup>①</sup> 作者单位是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其次，中国经历了高速、持续的增长。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地发展，而且是三十多年持续、高速地发展，这是一个事实。从外交的角度来讲，“崛起的中国”提法是不是合适，值得进一步讨论。但从学者的角度来讲，我觉得这是合适、客观的概念。

第二，崛起的中国是一个深刻变化的国家。在过去三十多年，由于实行了改革开放的政策，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已经是与以往不同的一个国家了。现在的中国是一个变化中的中国，而且是一个经历深刻变化的中国。变化之一是从封闭到相对开放，虽然对于有些方面来讲，开放还是不够，但是我们拿现在和过去相比已经生活在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里。我记得“文化大革命”的时候，跟外国人打交道是件很鲜见的事情。1975年我在国际旅行社工作，做翻译和导游，当时接待外国人是以个数来计算的，整个旅行社每年接待的人数也不多。当时只有三家旅行社——国旅、中旅和华旅，各家的情况都差不多。现在则完全不一样。

变化之二是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市场经济意味着什么？市场经济意味着跟外部世界的关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我们现在在世界上公开主张要维护一个自由、开放的国际贸易体制，这跟我们在国内实行市场经济有着直接关联。这种变化对我们的生活方式（包括思维方式、语汇）、与外部世界的交流都产生了很大影响。

变化之三是从贫穷走向富裕。当然，我们现在还不是都富，还不是很富，但是跟过去相比发生了很大变化，而且这个变化还在不断地进行中。

变化之四是从人治走向法治。过去领导说了算，现在法院说了算，当然这个转型还没有完成。虽然吴邦国委员长不久前宣布“中国已经建成了一个完整的法律体系”，但我们在法治的路上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尽管如此，这个变化依然是深刻的变化。

第三，中国是一个身份不确定的大国。崛起的中国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它的身份处于一个不确定的状态。中国到底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

国家？我们中国人说“我们是发展中国家”。但是当中国的领导人和外交官对第三世界国家的人讲“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的时候，大家都笑了。不是因为他们不相信中国领导人讲的话，不相信中国外交官讲的话，而是他们觉得中国跟他们太不一样，比他们发达多了。其实我们也很焦虑：一方面，在某些领域我们确实很发达，比如卫星上天，这些都给大家一种印象——中国很现代化，在某些方面很先进。另一方面，如果大家到中国中西部看一看那里的农村，你会发现那个地方是一个非常贫穷、落后的地方。

中国到底是一个贫穷的国家还是一个富裕国家？你要说富裕吧，很多人真的很穷；要说贫穷吧，中国的富翁可以说是全世界最多的。跟第三世界国家来比，中国的普通老百姓所享受的物质生活水平相对来说比较高。

那么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对外界来讲，崛起的中国在某种意义上还是一个令人困惑和令人不安的大国。

## 二 崛起的中国对外需求是什么？

崛起的中国和没有崛起的中国还有崛起以后的中国所需要的是不一样的。一个崛起的中国，有些要求跟过去是一样的，是从过去的角度来考虑自己的某些利益，因为它的身份还没有完全转变过来。有些要求跟过去不一样，是面向未来的，因为它的能力发生了变化，从一个普通的大国变成一个崛起的大国，对国家权益维护的力度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在南海问题上，过去我们能做的很有限，现在我们能做的还是很有限，但是比过去多了，因为能力发生了变化。

在利比亚问题上，中国的做法也跟过去不一样。要是利比亚过去发生政变，我们怎么办？只能静观其变，因为利比亚太远。现在我们可以派人、派飞机、派军舰、租船，把我们的人救回来。因为我们处在崛起的过程中，能力增强了，跟过去的做法就不一样。但是还没有达到那种

程度，就是在利比亚出事之前通过国际社会帮助他们解决危机。所以我们还只是一个崛起中的大国，我们对外的需求受到能力的限制，我们的能力和过去相比有了很大的提高，但和未来相比仍非常有限，或者说和需求相比还非常有限。

对世界秩序的追求、需求也发生了变化。过去我们是一种权益性的需求，即从这个秩序中得到好处。比如说贸易问题，我们就在关税和汇率上做文章，在短期内获得好处。现在不一样了，我们有更大、更高的要求。我们为什么加入 WTO？有很多原因，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希望进入 WTO 以后有机会对国际贸易体制规则的变化发表意见，参与规则的制定。

由于正在从普通大国到崛起大国转化，我国在处理和世界秩序的关系时，越来越多地从“权益考虑”走向“制度建构”。我们现在开始关心秩序，关心体系，想办法从长远的角度来打造国际秩序，使国际秩序不仅短期内有利于我们，而且长期内也有利于我们；不仅有利于我们，而且有利于国际社会，使得我们跟国际社会的关系变成一种可持续的关系。

崛起的中国对外的这种需要，也随着我们跟外界的关系变化而变化。过去我们是一个封闭的国家，现在我们是一个走向开放的国家。随着相互依存程度的提高，中国从过去对外界的需求很少，到现在对外界的需求很大很多。如果以前美国爆发金融危机，中国会高兴得不得了。我记得“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毛主席讲：天下大乱，天下大治，最后他们越乱越好。现在我们是一种什么心态？完全变了。现在我们非常担心欧债危机会引发全球性危机，我们非常担心美国顶不住。为什么？因为我们跟他们的经济连在一起。我们现在要求的不光是中国自己经济的健康发展，也要求世界经济健康发展，因为这两者之间有着必然的因果关系。

还有，国家利益的界定也跟过去不一样。过去我们的国家利益是以



边界来划界的，只管领土内的事情。现在我们的国家利益由于跟外部接轨，由于跟外部关系的密切，已经走向了世界。保护海外的中国公民和公司的利益也是国家利益。维护国际海洋通道的安全也成为中国国家利益很重要的一部分。为什么我们派军舰到亚丁湾护航？因为我们希望保持国际海洋通道的安全，这样我们的能源供应才能安全，我们的对外贸易利益才能得到更充分的保护。

中国从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变化也对中国的外部需求产生了很大影响。过去我们是一个纯粹的发展中国家，我们在贸易问题上、在气候问题上、在不干涉内政问题上说的话基本上反映了我们的利益，我们维护发展中国家的权益也基本上反映了我们的利益。但这些年也在发生变化，由于中国的崛起，中国开始把维护国际秩序、开展全球治理越来越看作是自己的事情。

我们为什么要在国际上维护一个自由开放的贸易体系？因为我们是世界上最大的贸易国。我们为什么要遏制气候变暖？因为我们拥有世界1/5的人口，如果气候变暖真的会造成世界灾难，我们将是受害最大的国家。我们反对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当某国爆发人道主义灾难的时候，我们支持国际社会进行干预。所有这些，好像又使得中国不太像一个发展中国家。现在中国的利益，实际上是一种混合体，既有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也有作为发达国家或者强国的利益。

还有，作为一个崛起的大国，中国到底需要建构一个什么样的世界秩序？这个问题现在越来越直接地摆在我们面前。中国想要一个中国的世界，还是一个世界的中国？这可能是中国人需要思考的问题。是回归一个传统中国的儒家秩序还是实现西方的理想？我们老抱怨说：“外国人总不相信我们，老说中国是危险。”其实，我们在处理对外关系时，无法让人家完全接受我们的说法，因为我们自己还没有想清楚到底需要一个什么样的世界。